

一个充满野性的自由精灵

——莫言《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形象分析

张爱萍

(皖西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的精神支柱渐趋萎软,人濒临“非人”的边界。本文试图以余占鳌野蛮强悍的个性、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展现我们民族久被压抑的顽强的生命力,并唤起人们“本性”的回归,民族精神的振兴。

关键词:人性;豪放不羁;追求自由;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02)06-0077-03

一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表明,文学表现的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本性,人的活生生的灵魂,人的独特的思想情感,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要求而最终以独特的“这一个”展现出来。

我国数千年的文学发展,虽深受儒家“教化”“载道”思想的束缚,但大写的“人”的倾诉、呐喊仍不绝于文学发展的长河。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轼……这些不拘礼法、忧国忧民的思想者们无不在其伟大的作品中展示了其倔强而痛苦的灵魂,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热切向往,从而其作品成为我们民族乃至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五四时代是一个真正发现“人”,高扬人性、鼓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伟大时代,数千年束缚、戕害人性的封建礼教遭到猛烈批判,个性解放的浪潮使五四新文学成为真正的“人的文学”。人,不再是拜伏在神灵的脚下诚惶诚恐的可怜虫,也不再是礼教威严下循规蹈矩、麻木不仁的道德符号。鲁迅笔下呐喊抗争的“狂人”、郭沫若飞奔狂叫的“天狗”、郁达夫的孤苦泣诉的“他”、以生命作赌寻求理想的“露莎”、纯情浪漫的“莎菲”、乃至毅然出走的“高觉慧”……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一颗颗寻求人生自由的鲜活灵魂,闪耀在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画廊之中。

然而在随之而来的革命浪潮中,革命文学自20世纪30年代起,成为我国文坛的主题。它以牺牲个性解放和人生自由为代价,来适应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于是,刚刚从“载道”文学中解放出来的大写的

的“人”被强行铸造进政治理论模式中,有血有肉、散发着生命热力的灵魂死亡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政治的传声筒。文革时期,这种可悲的倒退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管是50年代的朱老忠(《红旗谱》)、还是70年代的高大全(《金光大道》)和萧长春(《艳阳天》),可谓“英雄辈出”,然而可悲的是,他们统统没有灵魂,完全是一批被政治遥控器所操纵的“机器人”。人,不再是人。

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被冷漠和歪曲的五四文学精神重新放出光彩,大写的人再次成为文学艺术的灵魂。“我是谁”(宗璞《我是谁》)的痛苦而热切的呼唤表明“人”的再次觉醒。然而,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小说中面貌一新的人物或多或少成为作家们某种思想理念的代表。从大写的“人”的角度来看,80年代众多艺术形象还很难说是真正的“这一个”。

80年代中期,作家莫言向广大读者献出了他的“红高粱家族”作品系列,立即震动了文坛,引起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在当代文学中第一次塑造了以余占鳌为代表的一批独特的人物形象,生长在北国红高粱地上的庄稼汉们,不再是某种思想理念和道德模式的体现者,而是一批充满野

* 收稿日期:2002-11-10

作者简介:张爱萍(1979-),女,安徽寿县人。安徽大学中文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性,充满原始生命激情、豪放不羁、不屈不挠、追求自由人生的大写的独特的“人”!读者和评论者惊呆了,困惑了。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个鲜活而野蛮的生命,任何人们熟悉的政治和艺术理念都无法对他们“定位”。实际上,余占鳌身上,显示的恰是我们民族久被压抑的勃勃生机,宁折不屈的独立人格和不拘礼法的自由精神。

二

余占鳌,北国高大挺拔的红高粱哺育的一条刚烈的硬汉,他虽没有彪炳史册,但正是他们这些汉子创造了历史,打铸着民族精神。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由于疾恶如仇的个性,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作了低贱的轿夫,于是不顾一切地爱上戴凤莲。社会的逼迫使他成了一心自立为王的司令,一个驰骋在血红的高粱地里的自由精灵,一个最终黯然失色而又被人当作神供奉的人。我们从他呼啸而来的灵魂与生命中,倾听到一种历史岁月的痛苦诉说,一种被摧残、被压抑的人性的呼唤,一种灵与肉搏斗的呻吟,一种足以令人在回忆中过滤出某种积淀的告诫,一种只有在生长红高粱的土地上才能体验到的关于人、关于人的价值、关于民族精神、关于伦理道德、关于历史进程、关于整个人类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哲理。而莫言把这些深邃的思想都融入余占鳌追求自由的性格中,于是,余占鳌身上放出其独特的人性光彩,成为一个凝结着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这一个”。

余占鳌自由不羁的性格的最初表现,就是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又不得不为麻风病主人接新娘的轿夫,他本想戏弄一下新娘,然而轿内戴凤莲凄切的哭声却使他萌发出缕缕情思,“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寻常的预感,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把他未来的道路照亮了。奶奶的哭声唤起他心底早就蕴藏着的怜爱之情。”^{[1](P42-43)}这种感情在封建伦理道德中是不允许的,与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截然对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这更是一种“荒唐”的幻想。但充满生命野性的余占鳌不仅没有“灭人欲”地畏缩回去,而且他大胆地迈出了人生寻求的第一步:“余占鳌走过来,弯腰、轻轻的、轻轻的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的送回轿内。”^{[1](P42)}这一寻求个人幸福、生命尊严的努力,更进一步激发了他蛮野的冲动,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杀了欲抢劫戴凤莲的“吃饼的”。最后,他终于在那片热情如火的高粱地里与戴凤莲“野合”,在当时那个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这是大逆不道的,但他并没有一丝胆怯,而且“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1](P67)}如果说这是对冷

酷而扭曲人性的封建礼教的反抗,那么,他杀死了以金钱和权势强娶戴凤莲的单家父子,与戴凤莲结合,就是对封建等级制度最强有力的反抗。在中国封建专制下,社会要求人“非礼无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把“礼”当成一种绝对精神、绝对规范,一切以礼为依归、为定律,人被完全纳入“礼”的固定模式中,因此,人的个性也全部消融于这个模式中。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2](P67)}人成了“礼”的绝对理念的附属物,人是封建伦理范畴的人,被禁锢在封建政治伦理规范之内,是封建“伦常”所造就的人。按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说法,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人根本谈不上个性。但余占鳌不同,他的举动出于生命的本能冲动,作为一个没有接受现代个性解放思想影响而充满生命活力的农民,他意识不到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甚至还带有一种犯罪感,然而“人”的最初觉醒与人的尊严尽在其中。他敢爱敢恨,封建制度的那一套,在他自由灵魂的冲击下,现出丑陋的原形。尽管和在“五四”高潮中觉醒的现代知识青年比起来,余占鳌没有那么多明确的“思想”,但他以内在生命冲动为动力的“大逆不道”的一系列果敢举动,却更直接、更形象地表现出人性的要求,这些看似“冷酷”的行为,正是大写的人鲜活生命的勃发,是民族生机久经压抑的凶猛而壮丽的喷发。

在抗战和国共纷争的混乱局势中,他同样表现出独立不羁的品格,这是独立人格在现实社会的又一展现。他拉起的那支小小的队伍,虽然零乱不整,缺衣少枪,但他们按照自己的人生信念神出鬼没于红高粱地,喷发着自己的爱和恨。对待各种政治势力及地方势力的拉拢,他一概拒绝。国民党那个狡猾齷齪的冷队长来改编他时,他怒冲冲地骂:“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1](P25)}不受制于国民党,也不受制于共产党,当他打过伏击战,胶高大队的队长来联合他时,他也拒绝了,当时的他还不了解共产党,他只想在混杂中保持自己的本色,用他自己的话说:“余某识不了二百大字,要说杀人放火,我是行家里手,说起什么国家,什么党派,还不如宰了我痛快!”^{[1](P289)}他不受制于人,也正是他人性中独立意识的张扬。他拒绝政治、反抗一切势力的压迫,比如“花脖子”、黑眼,对于这些盘根错节的束缚,他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傲然屹立在血红的高粱地里。这种追求政治上的绝对自由,在自由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决不允

许自己被消融到任何政治束缚中,正表现了我们民族忧国忧民、疾恶如仇、而又豪放不羁的原汁原味的英雄品格。这个蛮野而光彩照人的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上出现,无疑给我们这个在强权下萎靡麻木的民族注入了原始的血性,成为新时期第一声真正的“人”的粗犷的呐喊,自由人生的宣言。

对侵略者的奋起反抗,表现了余占鳌不屈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存意志。他是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在抗战中,他失去了弟兄,失去了最亲最爱的人,“他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都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千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1](P10)}余占鳌就是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却实实在在地豁出了命伏击了鬼子,并且杀了日本鬼子的中岗尼高少将。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顽强奋战。余占鳌形象是我们民族精神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成功的展现。他的队伍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本人拒绝政治宣传,他的抗日义举不带有现实政治背景。余占鳌那充满野蛮和血腥味的抗日传奇无法纳入传统的抗日文学模式中,无宁说,作者是借外在的抗日义举去展现我们民族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强权与暴力,追求自由人生的可贵品质。由血与火铺就的通往自由境界的道路上,闪耀着的,不是政治的灯塔,不是阶级的符号,而是由原始生命力所催发的人性的光辉。因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所以,余占鳌不仅是当代文学史中富有创造意义的“这一个”,而且是“第一个”。他彻底摆脱了传统礼教、社会压迫与政治权力所造就的民族奴性,以内在生命冲动为动力,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坚决反抗各种压迫,誓死捍卫生存权利,豪放不羁,敢作敢为,享受生命的欢乐,体现了中华民族久被压抑,渐趋萎靡的原始生命力勃然喷发。他的身上散发出与野性紧密相连的人性的魅力。他的反抗是彻底的,但手段也是残酷的,他表达爱恨的方式就是杀人。“杀人”的行为,在抽象的道德说教中,无疑是“恶”的,但在具体的价值系统中,他的杀人行为是高度的善,高度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现;在爱情的天平上,余占鳌杀死仗势欺人的单家父子,则恰恰表现出了一种深邃的人性的善。他的本性的善与手段的“恶”并不矛盾。他是“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地上的司令——土匪头子,这里有着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同时土匪世代不绝,官府制造土匪,贫困制造土匪,通奸制造土匪,“土匪”代表了一种对封建的伦理纲常的反抗力量,是一种摆脱封建罗网的生存状态。余占鳌成为土匪,不是他想贪财而是他想活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他的性格决定

了他的反抗方式,他无法跳出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历史局限性,关键是恰在这一局限性里表现了我们民族豪放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存意志。

因此,他的愚昧的一面我们也不必特地美化与掩饰,比如,他为了给戴凤莲出大殡,敛财、抢棺、杀人,这都是他身上的负面因素,但这些正如素描画中的阴影部分一样,让人物更加真实起来。高尔基也说:“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这是必须知道和记住的。”余占鳌的性格是明暗结合的。综观他的一生,用《红高粱》里的话说,他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1](P2)}的人。正如狄德罗所说:“说人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3](P6)}残酷的社会压迫,野蛮的民族征服,必然导致发自生命本能的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是释放生命能量,表现生命哲学。一切外在政治的、道德的、阶级的评判都是狭隘而浅陋的。

三

余占鳌那雄强的生命状态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民族正在丧失什么,我们要寻回些什么,我们需要增加些什么。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格里高里,外在的压力使他变成了一只腹背都有甲壳的细腿甲虫,但从生存状态上讲,我们与他又有何异?我们又何尝不时时刻刻在算计世俗的得失,窥探政治风向以寻求安全的港湾。我们不敢爱不敢恨,在被压抑中走向萎靡与麻木,于是我们又拿来阿Q的法宝:健忘,精神胜利。我们一味的向现实妥协,乃至终身苟苟且且。在余占鳌的面前,我们是多么的相形见绌。显出种的退化,人性的扭曲,这必会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所以,在这里我要向所有人呼吁:我们是人,我们就要找回我们之所以是人的东西!而余占鳌在粗野的外观下所表现出的诸多精神品质恰是今天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比他更文明、更富裕的我们身上所缺乏的,而这,正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参 考 文 献

- [1]莫言.红高粱家族[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 [2]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社,1981.
- [3]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 [4]陆天明.大雪无痕[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